

柯美成 主编

理财通鉴

历代食货志全译

上

LICAI TONGJIAN
LIDAI SHIHUOZHI QUANYI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理财通鉴

历代食货志全译

（上）

（下）

（上）

理财通鉴

——历代食货志全译

(上)

柯美成 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财通鉴: 历代食货志全译/柯美成主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8
ISBN 978-7-5005-9218-1

I. 理… II. 柯… III. 经济史-中国-古代 IV. F1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618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人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80.50 印张 1 896 000 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00.00 元

ISBN 978-7-5005-9218-1/F·800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主 编

柯美成

副 主 编

徐培华 雷涯邻 余鹏飞 石教群
韩树锋 詹 松

主编助理

陆 芳

编译人员

柯美成	徐培华	雷涯邻	余鹏飞
石教群	张春瀛	高登成	韩树锋
詹 松	柯于谦	陆 芳	余 剑
张 敏	陈 曦	王 伟	李春献
高 明	罗 柳		

序

柯美成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先哲们为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民族繁衍昌盛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光辉业绩，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智慧宝藏。其中，历代政治家、理财家、思想家关于理财问题的卓越思想和成功实践，便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

理财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治国安民的核心问题。先哲们很早就认识到了理财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意义。《尚书》和《周易》是我国最早、最权威的两部古代典籍。《尚书》独载唐、虞、夏、商、周五代政事，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其中著名的《洪范》篇，记录了周武王于灭商次年，向“殷之三仁”之一的箕子咨询治国安民之道时，箕子向他讲述的应当努力施行的八种政务：“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据《尔雅·释诂》：“洪，大；范，法。”可知“洪范”即大法，亦即大政、要政。又按班固《汉书·食货志》开宗明义所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财，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可见，《尚书》是把足食、通货即管理好农业生产及财政、货币和商品贸易工作，作为治国安民第一、第二位的政务来突出和强调的。《周易》穷宇宙万物变动不居之妙，最富有思想性而充满神秘色彩，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及战国学者发幽阐微，在解释《易经》经义的《易传》中，最早提出了“理财”的概念。《周易·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据《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又韩愈《原道》：“行而宜之之为义。”可知《周易》也是把理财作为治国安民应该抓的大政、要政来突出和强调的。

正是缘于这种深刻的认识，先哲们自古以来在治国的实践中一贯十分重视理财活动。从虞舜教导天下十二州州牧，为政要做到足食必须抓紧农时，所谓“食哉惟时”，并任命弃为稷官（即农官），教人民按时播种五谷，到大禹定九州，从土质厚薄及山川物产的实际出发来确定各州的贡赋，再到周公诫成王为君不可逸于淫乐，须先知农事的艰难、小民的疾苦；从管仲相齐桓公，实行“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政策，官山海以专渔盐之利，分业定居以成四民之事，作内政以寄军令，终于使海滨区区之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到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耕织，抑工商，推行“利出一孔”的“农战”政策，使西陲地大而穷的秦国迅速走上富强之路，终而至于兼并诸侯，统一中国，再到桑弘羊在汉武

帝的支持下，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理财政策，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不仅为汉帝国开疆拓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开创了我国封建财政不单纯依靠赋税而致国家富强的成功范例；从刘晏受任于唐王朝颠危之际，大力改革漕运，整顿盐务，完善常平、均输之法，“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使国计民生危而复安，到王安石以一代大儒而彻底否定儒家“罕言利”传统，公然张扬“政事所以理财”的治国理念，摧抑兼并、垄断，推行青苗等法，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再到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进行封建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尧舜以来各主要时代和王朝，均不乏坚持理财治国的理念，以理财为己任，取得了卓著政绩的明君贤臣、理财高手。除上述诸人外，孙叔敖、晏婴、李悝、萧何、曹参、耿寿昌、曹操、诸葛亮、李安世、李世民、裴耀卿、杨炎、杜佑、张方平、耶律楚材、忽必烈、朱元璋、陶澍、爱新觉罗·玄烨等人，也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而在此数千年间，历代优秀思想家更是不断地提出了许多卓异的理财思想、理论和观点。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胡寄窗先生曾经从世界范围考察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经济（理财）思想的光辉成就，他条分缕析地将中西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后指出，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起码在五十九点上堪与西洋经济思想媲美乃至超前于后者。如：《禹贡》的平均财政负担思想，《周礼》的市场管理原则，《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论语·颜渊》的爱惜民力涵养税源思想，墨家的与民休息思想及价值概念，“计然之策”的农业经济循环论，孟子的功利主义观点及社会分工思想，《管子》的国家货币流通思想、货币数量说、“侈靡”消费观及市场价格均衡运动思想，贾谊的“法钱”概念，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司马迁的自利观点和经济放任思想，徐干的人口概念，傅玄的全国职业规划思想，鲁褒的货币拜物论，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周行己的通货贬值影响物价思想，洪亮吉的人口论，等等。此外，我国更有一些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如《管子》中奥妙精深的轻重理论，其意义和重要性相当于近代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然而在古代西洋经济学说中却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单旗的货币子母相权论，井田论及其异化的王田、均田思想，封建王朝盐、漕二政的经营管理思想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毋庸置疑，我国古代先哲们的理财实践和理财思想，是非常丰富多彩而且弥足珍贵的。其中所凝结的历史智慧，仿佛群星灿烂，在华夏文明的星空中闪耀着熠熠的光辉。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智慧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成果，不是某一个阶级所独创独有的，而是各民族经过世代共同努力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不是只能为某一种社会形态某一个时代服务的，而是可以一视同仁地为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时代服务的。古往今来的无数史实证明了，历史智慧作为曾经存在过的知识的结晶，它永远不会消亡，永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可以使人们有一个很高的起点，高瞻远瞩；它可以使人们储备大量的参照系，彰往知来；它可以使人们从鉴、势、理、道的理解、领悟、体察之中，学到聪明才智，学到胆识气度，进退裕如地迎接新时代、新使命的挑战。正因为如此，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诗经》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及后世之“鉴往所以训今”、“引古筹今”、“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等名言名训，就是这种史鉴传统世代传承的写照。

我们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都是继承和发扬史鉴传统，强调“古为今用”的积极倡导者和力行。毛泽东同志是举世公认的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和运用历史智慧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许多重大决策都借鉴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对历史的重视也是人所

共知的，他多次提倡学习历史，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又从新的高度阐述了学习、借鉴历史的重要性。他在2000年4月25日写给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的一封信中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们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意义。”江泽民同志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为应对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经济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国家和地区间竞争日益激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启动，到二〇二〇年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已经绘就，各方面的任务艰巨而光荣。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新的使命，又一次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在这样的形势下，更显示出利用我们民族丰富的历史资源，借鉴历史智慧的重要性。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以往之继承和发扬史鉴传统，借鉴历史智慧，基本上都是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着眼，而对于理财即经济方面则很少留意。这当然主要是历史的原因。从历史学传承方面看，以毛泽东终生爱不释手的、而今人所共知的《资治通鉴》为例，这部由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担纲编撰的大型编年体通史，就基本上是一部政治、军事通史，其内容明显偏重于政治、军事，而略于经济（理财）、文化。司马光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指导思想并未能在书中得到充分贯彻。对于当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为己任，而又热心于借鉴历史智慧的读者来说，读《资治通鉴》就不能不有极大遗憾。同时，这也还有认识上的原因。中国自明代中叶以后，封建地主经济逐渐走向衰落，而资本主义萌芽迟迟长不成气候，到了近代，经济及各方面发展更远远落后于西方，以至泱泱大国，饱受蕞尔小邦之列强欺凌。加上极少数“言必称希腊”的人对我国古代智慧进行虚无主义和妄自菲薄的渲染，以及新中国建立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同志不了解甚至不愿意去了解我国古代也曾有光辉的经济（理财）思想，即使一些对历史知之较多的人，往往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这个方面。

其实，如前所述，我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和理财实践也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智慧宝库。而且，我国历代有识见的历史学家们也已经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中国所谓正史——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食货志”，就是这种记录的集中体现。为此，我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正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理财智慧的大成之作，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如果说《资治通鉴》在实质上只是一部政治军事通鉴，那么，历代食货志则可以说是一部足以与之并存的理财（经济）通鉴。这也正是本书之所以取名《理财通鉴》的原因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理财通鉴》，对于今天的读者具有更重要、更直接的借鉴价值。

这主要是因为：(1) 它是一部财政经济史专著，内容更切合当今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发经济思想史资源的需要。(2) 《资治通鉴》从根本上来讲是为最高统治者写的一部书，是为最高统治者献统治术，其立论及史料的选择均着重于宏观方面，一般读者虽然可读，但真正可以参考借鉴的东西相对较少；而历代食货志则既有宏观方面的内容，也有中观以至微观方面的内容，无论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各层次的领导者，还是各阶级、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的人们，都可以读到切近于自身的内容，从而有所参考和启迪。(3) 从时间概念上讲，《资治通鉴》的正文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止于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9），共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而历代食货志朝代相衔，首尾相沿，记事上溯到黄帝时代，下迄于清朝灭亡（1911），时间跨度长达四五千年。特别是向后延伸的一千年中，宋、元、明、清几代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清王朝更是实现了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化。因此，它所记述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更易于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

总的看，对今天的读者来讲，历代食货志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但是，由于各志分散在内容广泛、卷帙浩繁的历代正史之中，检索参考，诸多不便。现在，我们将各志荟萃于《理财通鉴》一书，并对原文进行了白话翻译，从而可以为读者打破古今文字壁垒，较好地理解和借鉴古人理财智慧，提供一定便利。这应当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的这项工作策划、启动于 1998 年，从那时至今转眼八九年，作为《理财通鉴》的主编，其间酸甜苦辣，已成过去，已不必言。而本书几位副主编，徐培华教授是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雷涯邻教授是中国地质大学的副校长，余鹏飞教授是退休多年、壮心不已的历史学者，还有石教群博士、韩树锋博士、詹松主任，以及包括张春瀛教授、高登成研究员在内的所有参编人员，大家都以热情、认真、执着的态度，为这本书的编撰、修改和完善，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我常念及与他们合作的愉快。现在，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贾杰同志、副总编辑李乃君同志以及陶家风主任等领导和朋友的关怀和关照下，这本书终于付梓，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见的。这亦无庸赘言。同时，我又颇为惴惴。古籍今译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早在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谈到对经传的理解时已说过：“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后人不知，世相离远”（《论衡·自纪篇》）。王充生活的时代去经传问世的年代不过数百年，一代大家已有此等感受，而全部《食货志》写成的时间跨度长达两千余年，其间王朝更替、制度兴革、风俗移易、概念嬗变、语言异化，史志记事又往往失之过简，湮没踪迹，加之译者能力有所不逮，古文今译，就难免舛错，难期尽善。唯其如此，本书所能做的，不过是为欲研究、借鉴历代食货志的朋友提供一个阅读的参考，省却一些翻检辞书之劳。亦唯其如此，书中所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尚祈读者海涵，并敬请不吝赐教，指正书中疏漏讹误，以期使本书在将来有机会修订时，做到尽可能好一些、完善一些。

是为序。

王充《论衡·自纪篇》：“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后人不知，世相离远”。王充生活的时代去经传问世的年代不过数百年，一代大家已有此等感受，而全部《食货志》写成的时间跨度长达两千余年，其间王朝更替、制度兴革、风俗移易、概念嬗变、语言异化，史志记事又往往失之过简，湮没踪迹，加之译者能力有所不逮，古文今译，就难免舛错，难期尽善。唯其如此，本书所能做的，不过是为欲研究、借鉴历代食货志的朋友提供一个阅读的参考，省却一些翻检辞书之劳。亦唯其如此，书中所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尚祈读者海涵，并敬请不吝赐教，指正书中疏漏讹误，以期使本书在将来有机会修订时，做到尽可能好一些、完善一些。

理财论：概念的嬗变与思想的轨迹

——卷首絮语

柯美成

《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是中国古代所谓正史——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之经济（理财）史专著的汇编和白话译本。本书除《汉书·货殖传》因与《史记·货殖列传》内容重复未收入外，其余各史食货志皆囊括其中，计有《史记·平准书》、《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晋书·食货志》、《魏书·食货志》、《隋书·食货志》、《旧唐书·食货志》、《新唐书·食货志》、《旧五代史·食货志》、《宋史·食货志》、《辽史·食货志》、《金史·食货志》、《元史·食货志》、《明史·食货志》、《清史稿·食货志》，共为十五志，七十四万五千余字。

中国古代正史“食货志”体例，创自班固《汉书·食货志》，而滥觞于《史记》之《平准书》及《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开篇写道：“《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可见，“食货”一词的含义，即今之所谓财政经济，食货问题也就是社会经济问题。历代食货志朝代相衔、首尾相沿，构成了洋洋大观的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经济通鉴”。然而，本书不名“经济通鉴”，而称“理财通鉴”，这是为什么呢？简而言之，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开始使用于我国，只是二十世纪初叶的事情，而由此一直上溯到先秦时期，我国古代文献中相当于现代“经济”的用语，则是“理财”、“富国”、“治生”、“平准”、“食货”和“生计”等等。“经济”一词虽时有出现，其含义则与现代“经济”一词差别甚大。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本篇特就关乎题旨的“理财”和“经济”二词作一番考证，并结合考证，对中国古代理财思想史进行提纲挈领的概述，以期为本书的读者尽量多提供一点信息，对读懂弄通本书有所裨益。

一、“理财”一词的问世和受冷落：论先秦富国、富民之争与传统富国之学的建立

“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里，“理”是治理、整治，引申作管理；“财”指财物、财货、财富。那么，“理财”一词即正如《辞源》的释义，指“管理财物”。至于《辞源》随之又说“后指管理财政”，则已含概念嬗变之义。可见，“理财”一词问世时，其本义与现在人们的理解比较接近。学术界历来有“《系辞》相传是孔丘所写”之说，而按照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的说法：“《系辞》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的作品，著作年代在老子以后，惠子、庄子以前。”

(《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这就意味着,“理财”一词问世迄今至少已有二千三百年。饶有意味的是,从战国中期至北宋王安石变法,即二千三百年间的前一大半时间里,出自儒家经典的“理财”一词竟未被思想家、政治家们所接受,甚至备受冷落,几至被人们遗忘。以笔者之寡闻,仅见汉王符《潜夫论·叙录》有云:“先王理财,禁民为非。”又晋武帝泰始二年的诏书中有云:“理财钩施,惠而不费,政之善者也。”(《晋书·食货志》)。此外罕有使用“理财”一词者。可是,自王安石一旦力主理财之说,理财一词随即频见于两宋及后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著述,几至言理财而成风。这种始则近乎销声,继而张扬百端的语言现象,是纯粹出于偶然还是别有原因呢?

以笔者愚见,当属别有原因。这原因就是,当理财一词问世之时,正值先秦“富国之学”即传统的“富国”之学建立之际,先哲们在关于治国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各抒己见,如法家强调富国,儒家突出富民,墨家主张“国家之富”、“人民之众”,道家提倡“无为”、“小国寡民”,商家则忙于研究“积著之理”、“治生之术”,等等,特别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法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围绕究竟应当富国还是富民以及富国与富民的关系问题互相攻难,而富国之学正是在这种诸家争鸣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批判、吸收和扬弃,从而融合了各家学说中的精华。当先哲们口不离“富国”和“富民”这些带有鲜明倾向性的词汇,热衷于“争”与“鸣”时,“理财”这个显然带有中性色彩的概念,自然不足以表达他们各自思想和主张,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冷遇。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先秦富国之学建立的过程。首先应当说明,以“富国之学”命名一门学问只是今人的发明,古人书中则只有“富国之道”、“富国策”等概念。富国之学的提法现在已被学术界所认同,所以我们也就沿用了。总的看,这是一门从宏观角度即从整个国家和全社会的角度研究治国问题的学问。鉴于“国”与“民”这一对基本概念在“治国”这个命题下所处的对立统一的地位,先秦富国之学的建立也就经历了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二者关系的长期的理论争鸣和实践探索。一般来说,先秦富国之学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春秋初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相管仲。管仲(约前730—前645),名夷吾,齐国颖上(今安徽颍上县)人,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善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的理财家。管仲治国主张从理财入手,把富国富民作为目标,他认为“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因此,“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二者应当兼顾:“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问》)。当然,在实际上富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富民则是富国的需要,因为“民富则易治”(《治国》),“足下”是为了使“民无怨心”,“下亲其上”(《牧民》),即归根到底是为了“富上”。在管仲的时代,这样提出和认识问题是难能可贵的。尽管《管子》一书的思想并非管仲的“专利”,而多为战国时期齐国法家托名管仲所阐发的自家的理论和主张,但管仲相齐四十年,使海滨“区区之齐”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管晏列传》),直到战国中后期,齐国仍一度与秦国并称为东西两大强国。而管仲的功名事业几百年中亦一直为齐人所推崇。据此可以推断,《管子》上述富国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属于管仲的,不过是经过了后人的整理、推衍增广和完善而已。进而也就可以认为,在管仲时代,我国古代的富国之学已经奠基。

管仲身后近百年,诞生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人,祖先原为宋国公室贵族,因失

势移居鲁国，失去贵族身份，到孔子生时已沦为贫贱。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当春秋末期，其时封建领主经济开始土崩瓦解，封建地主经济蓬勃兴起，在包括战国时代在内的二三百年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大变革、大动荡、大调整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表现出异彩纷呈的格局，由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拉开帷幕，儒、道、墨、法、名、农、商、杂、阴阳、纵横等各学术流派纷纷揭橥而起，其中有的大学派又分为若干支派，在被后世称为先秦诸子的各学派、支派代表人物之间，展开了持续几个世纪的所谓“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富国之学得到了迅速发育并渐趋成熟。其间，儒、法、墨三家代表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史记·货殖列传》：“虽人各亲其亲，各安其家，善其俗，美其行，而天下归之。”

首先是孔子对管仲的富国思想提出了批评。尽管后世的孟子宣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但孔子本人却充分肯定了“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历史功绩，他由衷地赞叹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并对管仲治齐所体现出来的富国思想表示了有保留的认同。说“有保留”，主要表现在对富国与富民关系的认识上。《论语·颜渊》记录了孔子弟子有若与鲁哀公的一段著名的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若的这最后一段答词，历来被认为代表了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概括了孔门对富国与富民关系的基本立场。按照这一立场，孔子在实际上不同意管仲富民从属于富国的观点，而是主张把富民放在第一位，认为民富即国富，富国就应当藏富于民。说“认同”，不仅表现在孔子对管仲治齐业绩的肯定，而且表现在他并不完全否定为国家理财——足国用的行为。孔子反对的只是“聚敛”和“贪冒无厌”的重赋盘剥，而主张按“周公之典”实行轻徭薄赋，即行“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的这种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思想，可以说是对管仲富国之学的极其重要的补充，为古代富国之学的最终建立开拓了新的思路。《史记·货殖列传》：“虽人各亲其亲，各安其家，善其俗，美其行，而天下归之。”

进入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较之春秋时期更加显示出一国富强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杰出的政治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富国强兵的一系列主张。商鞅（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因系卫国宗室远支，又称卫鞅，后相秦封于商、於之地，号商君，故史称商鞅。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曾至魏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家臣）。魏国是战国前期法家思想非常活跃的国度，法家始祖李悝及吴起等曾在这里先后进行过颇具影响的变法。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商鞅因在魏不得志而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先任左庶长（秦爵第十级，带兵充偏将），继升大良造（秦爵第十六级，相当于相国兼将军），前后当政十八年，两次实行变法，一心以富国强兵为务。商鞅认为，要使国强，必先国富，所谓“国富者强”，“重富者强”（《商君书·去强》），“国不富，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商君书·农战》），富与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商君书·立本》）。因此，从理财思想角度来考察，商鞅学说的核心和目标就是一个“富”，即富国。可以说，在战国中期以前各学术流派代表人物中，没有谁比商鞅更集中、更突出地强调了富国的重要意义。《史记·货殖列传》：“虽人各亲其亲，各安其家，善其俗，美其行，而天下归之。”

那么，如何实现富国的目标呢？商鞅说：“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农战》），“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粟爵粟任，则国富”（《去强》）。换句话说，就是在治国的方针政策上要突出一个“农”字，所谓“圣人之治国作壹，转之于农而已矣”（《农战》）。为了“令

民归心于农”，商鞅一方面“制土分民”，废井田，开阡陌，以满足人们对土地私有权的要求；同时，实行重农贵粟，奖励耕织政策，以调动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又根据“欲农富其国者，……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的认识，效法先驱者管仲，实行盐铁官营，“壹山泽之利”；效法前辈法家李悝，抑工商，禁末作。这样，他就为实践自己的富国主张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富国之策，从而形成了法家富国之学的学说体系。

从理论上讲，商鞅富国之学在对待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是相当薄弱的。只是由于商鞅变法富国之效显著，而民亦“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所谓“民以殷盛，国以富强”（《史记·李斯列传》），所以在实际上实现了既富国又富民二者兼顾的目标。但是，从商鞅关于“家不积粟，上藏也”（《商君书·说民》）即强调藏富于国的主张，以及他关于“民贫则为富，力富则淫”（《商君书·弱民》）的认识来看，他所主张的富国不仅与孔子所主张的民富即国富大相径庭，并且也有别于管仲所主张的富民所以富国，他之所言富国尽管也包含有“富国家”即增加整个国民的财富之义，然而在本质上又主要是指“富国库”即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并非真正地着眼于“富国家”，更勿宁说着眼于富民。法家富国之学的这种偏颇性，或许正是因为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是政治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学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就在商鞅在客观上建立了法家的富国之学的同时或稍后，孟子针锋相对地构建了儒家的富民之学。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市）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早年丧父，母教甚严。相传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或子思的门人，他亦自命尽得孔门真传，以继承和发扬儒家道统自任，是战国前期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他热心宣扬儒家学说，以“仁政”思想游说诸侯，所到之处备受礼遇。同时，他亦热切期待用世，曾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可是，由于他的学说被各诸侯国君主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因而始终未能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平心而论，孟子的学说，仅举理财思想而言，还是有不少相当卓越的成分的，但是他又确实往往走极端，提出了一些十分偏激的观点和主张。他的富民思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孟子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富民思想，不仅提出了要把富民作为治国的重要目标的主张，并且为实现这一主张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一再向人们宣扬他的“恒产”论，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并一再向人们展示“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小农经济美妙画卷，要求统治者让人民过上“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的温饱生活。这种主张和设计，无论其社会实践价值如何，从理论上讲，都是极其珍贵的。但是，孟子富民思想的另一面却表现了他的历史的保守性甚至反动性。商鞅变法是战国前期震撼列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其进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孟子对这种历史进步却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从儒家的富民主张出发，偏激地认为提倡富国就是主张对百姓搜刮、聚敛，断然拒绝自管仲以来历代成功政治家所推行的许多有效的财政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商鞅的农战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攻击法家“为君辟土地，充府库”的富国政策是为暴政服务，是“富桀”；大骂为富国提倡重农“辟草莱，垦土地者”是犯罪，是“民贼”，应当受到刑罚（《孟子·告子下、离娄上》）；他还反复鼓吹“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的迂阔教条，这就不仅否定了所谓“富国库”意义上的富国主张，甚至也否定了“富国家”意义上的富国主张。显然，孟子富国思想中的这些过激因素是不可取

的。笔者以为，鉴于孟子富民思想对富民与富国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缺少冷静的思考和论述，因此它远不足以形成一门所谓“富民之学”。

在儒、法两家之外，战国前期著名思想家墨子的富国论也十分引人注目。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因不满儒家繁琐的“礼”而创立墨家学派，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学与儒学在战国时期并称“显学”。然而，墨子的富国论却师承孔子的富民思想即他关于治国要使百姓既“庶”且“富”的主张（《论语·子路》），同时又赋予“富”字以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墨子一再讲“古者王公大人之为政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富，则从事乎众之”（《墨子·非命上、节葬下》），可见他所说的“富”与“众”并不等同于孔子所说的“富”与“庶”，富民在这里已转化为富国。然而墨子所说的富国，主要是指增加国民财富，即增加一国或全社会财富的总量，所谓“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墨子·节用上》），可见他的富国概念同时也包含了富民的因素在内。尽管墨子也没有就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论述，然而仅此已足以显示出他比晚生的孟子要高明许多。

集儒、法、墨诸家富国富民思想之大成，建立了比较完整、科学的中国传统的“富国之学”体系的是荀子。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赵人，时人尊称为荀卿或孙卿，是战国后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十五岁游学齐国，曾三次出任知名学府“稷下学宫”的祭酒。后至楚任兰陵令，又应聘游秦，见过秦昭王。不久回兰陵，教授弟子并从事著述，著名法家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荀子属于儒家学派，他对于孔子以来的儒学，有所继承，也有所扬弃，对其他各家学派也都有所批判吸收，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荀派儒学，即所谓“孙氏之儒”。荀子治学方面很广，于哲学、政治、理财以至文学等无所不包，其中关于理财问题的研究颇具特色。有人认为，荀子理财思想标志着封建理财思想的成熟阶段，代表了先秦理财思想的最高水平。这样评价虽不免有溢美之嫌，却并非全无根据：荀子的某些理财思想，包括他的富国之学，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

兼采诸家之长而弃其短，从理论上辩证“富国”的概念，阐明“富国”与“富民”的关系，是荀子对古代富国之学的重要完善，也是对封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大贡献。如前所述，在荀子以前的“富国”概念实际上有广、狭二义，墨子的“富国家”与商鞅的“上藏”即“富国库”就分别属于二者，然而人们对这二者的关系始终未阐释清楚。荀子在他的代表作《富国》篇中则第一次澄清了这一概念上的混乱。他将“富国”定义为“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这里，“上富”即“富国库”，“下富”即“富民”，既富国库又富民，国家和百姓的财富都多得无处收藏，这就叫作“富国”。如此定义，又完善了墨子主张“富国家”而要求国民财富以极大幅度（“倍之”）增长的提法。这样，荀子就以自己广义的“富国”完成了一次概念革命。

与此相关联，作为一门研究宏观管理的学说，荀子富国之学还在以下几个方面突出了自己的特色。首先，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他主张必须以富民为富国的基础，认为如果仅考虑富国库，而不考虑富民，就会靠搜刮和聚敛来实现富国目标，那样不仅达不到富国目的，甚至会导致国家灭亡，所谓“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篚、实府库。筐篚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王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荀子在富国与富民关系上的立

场，正是他弘扬儒家传统思想中仁政主张和民本观念的结果。管仲治国也讲求富民，但富民只是为实现富国这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而荀子则不然。荀子不止一次地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哀公》）正是鉴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对人民更讲仁爱，施仁政，所谓“仁义德行，常安之术”（《荀子·荣辱》），只有真诚地对待人民，才能常安、久安。他坚决反对以施小恩小惠之类的“偷道”、“奸道”（《富国》），像对待小孩子那样哄骗人民，沽名钓誉，急功近利。而在对待义与利的关系上，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既以主张富国摒弃了孟子“何必曰利”的迂阔教条，又抨击了“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荀子·王霸》）的行为。可见，荀子的富民思想固有其民本色彩，他之于富民与富国二者正是作等量齐观。

其次，在生产与分配（财政）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本末、源流的概念和“开源节流”的方针。他说：“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窳仓廩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富国》）把生产看作财富的“本”与“源”，而财政只是财富的“末”与“流”（即对财富的使用和再分配），生产生生不息，财政自然充裕。传统儒学以德为本，以财为末，所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大学》），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法家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主张“事本禁末”（《商君书·壹言》），重农抑工商，只着眼于不同生产部门的关系。只有墨子从生产角度提出了“本”的概念，但却是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立论，所谓“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生财密，用之节”（《墨子·七患》），显然没有顾及到生产与分配（财政）的关系。相比之下，荀子的本末、源流论不能不说是于富国主张更具有直接意义的创见。而他所主张的开源节流方针，成为迄今两千多年来历代王朝、不同社会制度下财经工作的金科玉律，更显示出荀子为建立传统的富国之学而集诸家之长是何等的科学、严密。

再次，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强本节用”的见解。而他之所谓节用，与前贤墨子所倡导的“节用”虽有近似之处，亦有近乎质的区别。其近似之处是，二者都注意了把节用与发展生产挂钩，墨子强调“固本而用财，则财足”，荀子则声称“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天论》）。其近乎质的区别是，墨子一味强调“节用”、“非乐”，荀子则将“节用”与“礼”挂钩，主张“节用以礼”。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也。”因此，他以“隆礼”和“明分”为节用的精髓，尖锐地批判了墨子关于“节用”、“非乐”的概念，指出其所造成的“赏不行”、“罚不威”的消极后果，主张通过节用以“赏行罚威”、“进贤”退“不肖”（《富国》），从而又显示了其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独到之处。

最后，在为着“富国”而处理对内对外关系上，对内，荀子一方面主张“以政裕民”，即实行比较开明的内政。他解释说：“轻田野之说，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另一方面，他反对君主急功近利，指出“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富国》），尤其猛烈抨击“聚敛计数之君”，认为“聚敛者，……明君不蹈也”（《王制》），“至贪，是愚主之极也”，指出其“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富国》）。一正一反，体现出荀子为了富国裕民，主张爱惜民力，薄取于民，藏富于民的远见卓识。对外，荀子主张独立自强，认为只要“修礼以齐朝，平政以齐民”，“辟田野，实仓廩，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那么，即使“百里之国，足以独

立矣”(《富国》)。这种在对内对外关系上体现出的传统的儒家思想色彩,较之法家商鞅的“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的农战论,也是别具一格的,或许具有更广泛的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富国之学从管仲奠基,到荀子建立起儒法趋同的、富国富民统一论的学说体系,前后跨越了几个世纪。时贤有言:先秦时期的理财思想,基本上就是在对富国、富民问题的探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而中国传统的理财思想,主要也就表现为富国之学。正是有鉴于此,笔者才敢于作出了本段开头的推论:“理财”一词正是由于其问世时内涵的宽泛性、不确定性,因而不被时人所认同和接受。汉语词汇的传播中已屡屡被证明有一种偶然中又带有某种必然性的文化现象。自先秦历汉唐迄于宋初,理财一词备受冷落,而富国之学大行其道,历代思想家、政治家论及理财问题皆口不离“富国”与“富民”,鲜有称“理财”一词者,不过是这种文化现象的一个有力佐证,此外似乎别无解释。

二、重提“理财”和理财概念的内涵:论王安石的良苦用心及其理财论

“理财”一词被人们普遍认同并广泛使用,已是它问世一千三百年时的北宋中叶。首开风气的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理财家,也是大文学家的王安石。说来令人慨叹。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他们在提出某一思想、理论和主张时,无不希望精辟、卓越,济国益民,然而却往往由于各种因素(诸如宏观方面的国内政治、内外关系,微观方面的个人出身、阅历、学识、地位、职责等等)的影响,使他们又自觉不自觉地偏执于一端,难求或不求万全。即如在富国富民问题上,古代正直、有远见的政治家们未始不知求两全之美,然而其中的一些人,只因身在庙堂,食君之禄,不得不把自己定位在“朝廷”的立场上,执著于狭义的富国主张,以“富国库”即增强国家的财政能力为己任,而忍心利用、侵夺以至牺牲百姓的利益,否则,不等他们功成名就,或许已遭到杀身之祸。管仲是幸运的。史载管仲辅佐齐桓公首霸诸侯,因此受到桓公的极高礼遇,被称为“仲父”,受赐之多,使他“富拟于公室”(《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死于桓公之前,不仅自己得以善终,而且子孙沐其恩荫,世为大夫。而商鞅却没有那么运气。商鞅辅佐秦孝公两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战国策》作者称赞当时秦国“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也盛赞商鞅变法使“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也给了商鞅很高的礼遇,“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史记·商君列传》)。然而孝公一死,这位对秦国功劳卓著的改革家,就因其变法触犯了旧领主贵族的既得利益,转眼间被孝公的继承人处以车裂的酷刑,其身后也是一片责难之声。

当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治国理财思想受到其时代、阶级的局限都是不可避免的。先秦诸子如此,后世大有作为者亦概莫能外。如汉、唐两代著名的理财能手桑弘羊、刘晏就是典型的例子。桑弘羊、刘晏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所实施的富国之策,无不是步管仲、商鞅后尘,以管、商为范本而有所革新、有所发展。桑弘羊理财,“修太公、桓、管之术”(《盐铁论·轻重》),其思想体系除极少方面(如农商关系)外,基本上承袭了法家的一套,所谓“学本管、商,才显汉廷,变更制度,富国强兵”(吴慧:《中国古代六大改革家》)。在有名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为他所推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以及统一币制、屯田备边等一系列理财政策和措施,与代表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

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关于义与利、富国与富民的关系问题上，他坚决反对儒者空讲“仁义”，以“义”抑“利”，揭露了他们“内贪外矜”（《盐铁论·毁学》），借口“利归于下”，为私家打算，与国争利，欲使政府“无可为者”（《盐铁论·取下》）的本质。他认为当世之务在于“安国家利人民”（《盐铁论·相刺》），因此要大兴国家之利：既要富民更要富国，富国重于富民。桑弘羊所遵循的，正是狭义的“富国之学”的主张。刘晏则自称学“弘羊重兴功利”，别人也赞他是“管萧之亚”（《新唐书·刘晏传》）。考察刘晏从主持东南财政到主持中央财政数十年的实践，无论其改革漕运、整顿盐务，还是实行常平制、均输法等，都可以从先秦法家的理论宝库里找到依据，而与桑弘羊的做法一脉相承。桑弘羊理财“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刘晏理财“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敛不及民而用度足”（《新唐书·食货志·刘晏传》），在增强国家财政能力方面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也可见，荀子的“富国之学”从理论上讲虽然是相当完美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未必能尽行其道。“一个概念的确立只能根据实践而不是思想家的头脑”（叶世昌：《十大理财家》），桑弘羊、刘晏成功的理财实践说明，尽管从理论上讲，“富国之学”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富国”更科学、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甚至明智的统治者的愿望，然而作为概念的“富国”，从根本上讲只是指一国财政实力的增强。因此，“在正统儒家看来，富国并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同上）。

由此可以得知，为什么直到北宋初年，理财一词备受冷落？是因为中国自先秦以来的理财思想主要就表现为“富国之学”，而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使人们还在那里为“富国”而进行争论和探索。进而也就可蠡测：为什么到了北宋中叶，王安石要别开生面，以“理财”论取代“富国”论？是因为“富国”的概念为“正统儒家”所不取，变法需要寻求新的思想武器。宋代以前以“富国”为务的著名政治家、理财家，在新旧体制的更替、撞击或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中，几乎都成了牺牲品。桑弘羊与商鞅一样，不仅惨遭杀身之祸，而且身后犹为儒家人物所歪曲和诟病；刘晏虽然身后幸免于儒者的贬损，而生前已被人排挤构陷，终至贬死。不敢妄断这些因素是否就促成了王安石摒弃“富国”而鼓吹“理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作为一代大儒，尽管对先秦法家和法家人物桑弘羊的一套很有兴趣，却不会不意识到，借“理财”之名来标榜儒家道统，更有利于争取人主——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以推动他所要实行的变法。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简述一下王安石其人及其鼓吹理财的若干主要言论。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初任地方官多年，勤政爱民，不贪财，不媚上，对民间疾苦和时政弊端有所体察，并有所兴革，颇见成效。如他在知鄞县时，“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宋史·王安石传》）。这一段地方工作的实践，为他后来力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可以说，他为自己后来的改革进行了试点。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由知常州府移任提点江东刑狱，在进京述职时，他写了著名的《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请求皇帝“法先王之政”，变革当时的法度。以笔者的浅陋见识，宋代第一个鼓吹“理财”的人是王安石，而王安石第一次重提“理财”是在《万言书》中。王安石针对北宋积贫积弱，“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以及“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的国情世态，借议论官吏俸禄问题，提出了理财的一项带根本性的原则。他写道：“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